

江邨三十年精力所聚

張華芝



高士奇的收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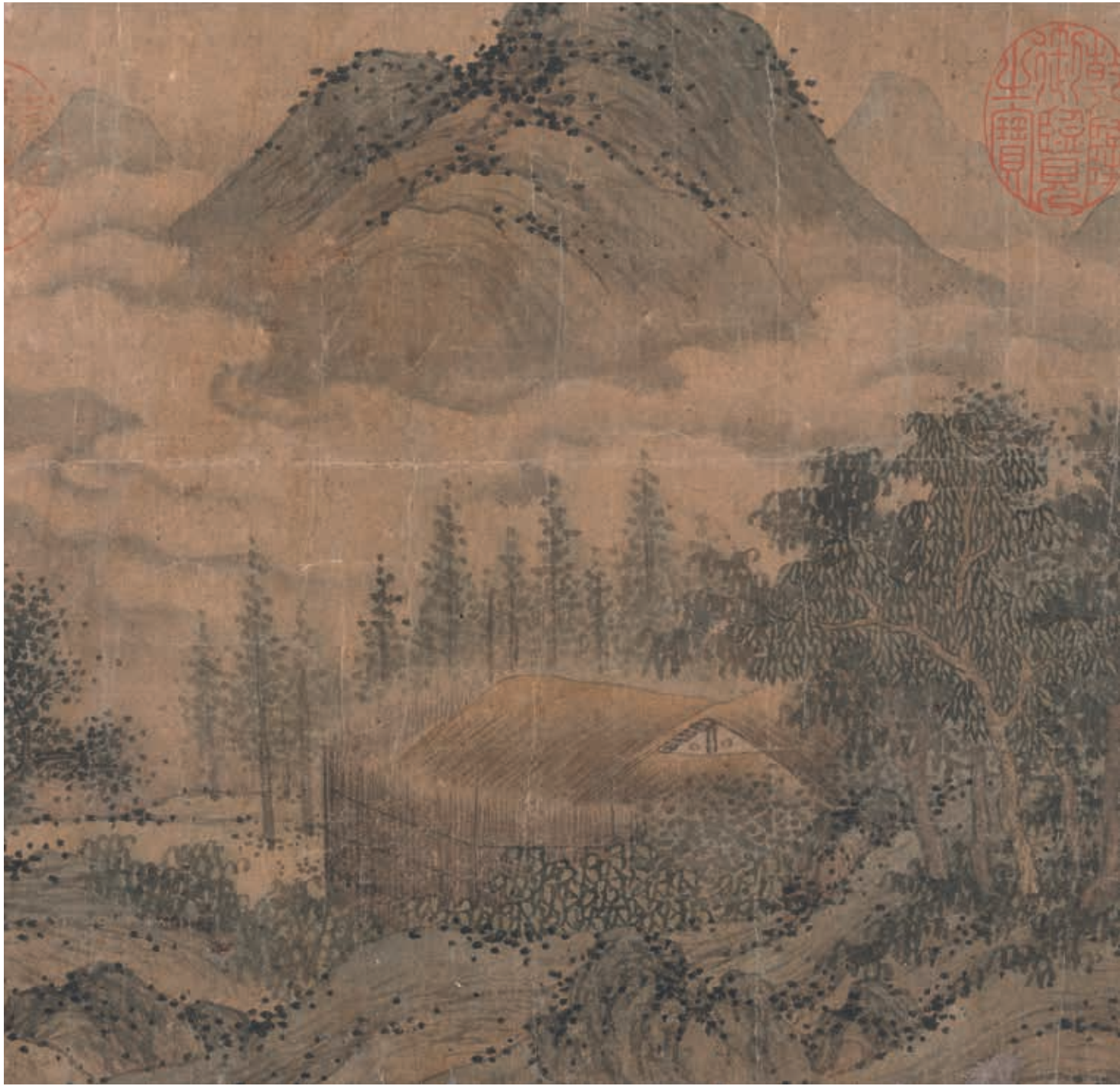
高士奇以精於書畫鑒賞，享譽清初。凡經其過眼的法書名畫，撰有《江村銷夏錄》三卷為之記錄，至於其個人耗費三十年精力搜聚的私家珍藏，藉由其後世子孫於嘉慶年間留出的一本密藏底帳，讓世人得以窺其收藏梗概。雖然這是歷來第一本記載了書畫時價的傳世帳目，為研究書畫鑒賞及藝術市場價值的重要資料，但也為高氏個人，在身後百年招致不少非議和引發相關議題。

題跋習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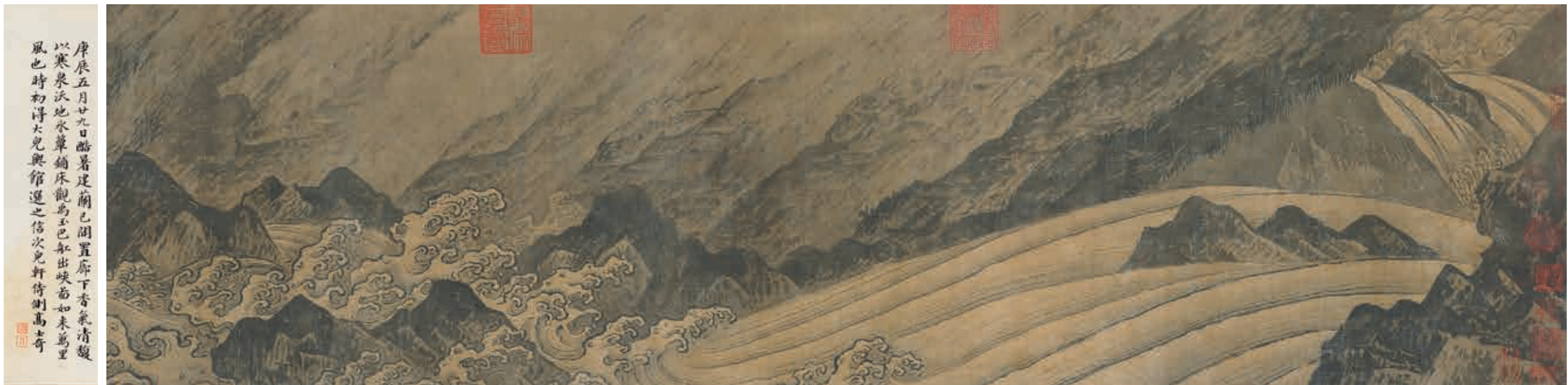
高士奇在〈雜記〉一文中提及，入值大內時，曾見過三異物「一小金合：內貯雕刻牙器百種：，用金鑷鉗而觀之。其一鏤象為球，周身百孔。凡九層：名『鬼工球』。其一酒杯，二十有四，由大及小如窄堵波：鏤木為之：薄如紙：然能注酒。三者精巧絕倫：守者曰，此自外國航海來貢，云皆鬼工所作。藏之侈，為異寶。」

（圖一）高氏以《尚書》有言「不役耳目，百度為貞，又曰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認為「今此三者足稱異物，然皆無益於用。使寶而藏之，天下將必有窺朝廷之嗜好，競以奇技進者。宜天子有鑒於書之所言，棄而不取也！」對於稀奇珍寶，高氏以書之言，建言皇上勿好，但高氏個人卻是珍品文物高品味的追求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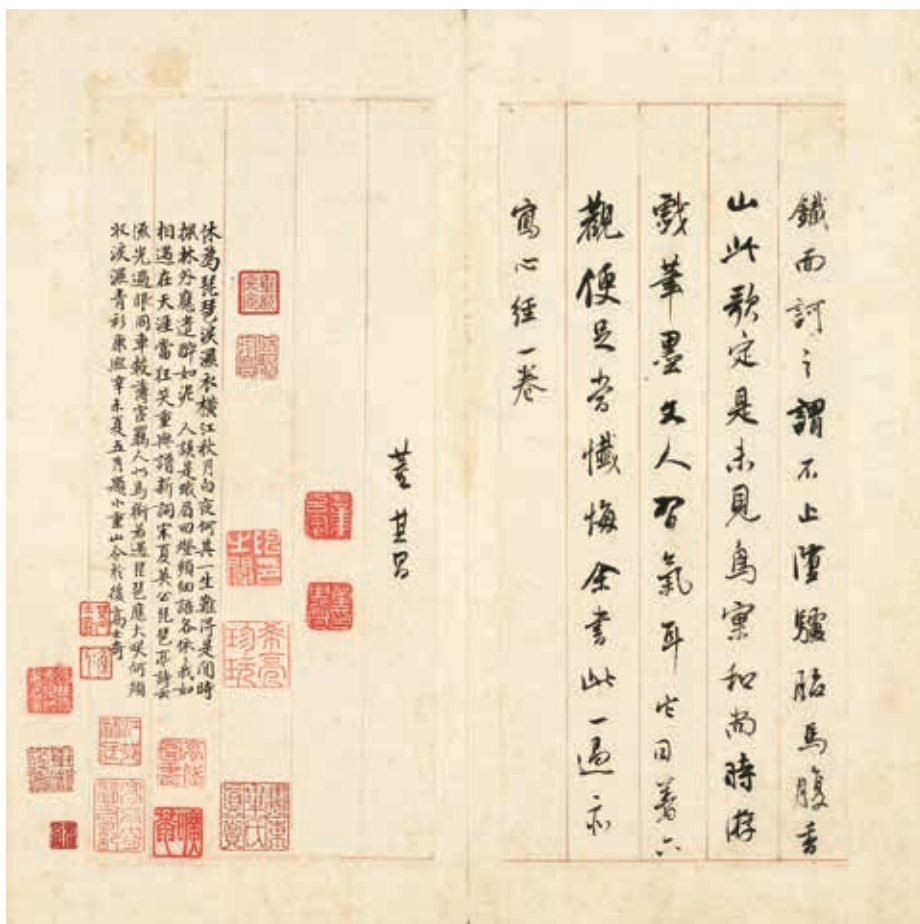
院藏書畫上鈐有高氏印記計有四十五組件，高氏在其中廿六件留有題記，另受友人之請評賞，賦觀跋兩件、唐懷素〈自敘帖〉卷尾為借觀題跋。計廿九件書畫題跋中，高氏在署款前，提過的書寫使用文具或「宋硯與自製書畫墨」；或「花嶼堂墨、紫毫筆」；或「文三橋耕井硯」；或「用唐澄泥研、方于魯墨」。一旁「煮惠山泉，試火前龍井茶」；或



明 陳汝言 喬木山莊圖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拖尾高士奇跋 局部 圖二 宋 夏圭 長江萬里圖 卷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三 明 董其昌 書白居易琵琶行 冊 未開高士奇題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以官窰宋瓶」插芍藥花枝列案頭。由此馬跡蛛絲當可推論高氏非僅書畫文物藏家，對於生活品味亦是十分考究，因此古物珍玩、精品器用皆應屬

他搜羅珍藏的範疇。

嘗在《歸田集》言「余性耽卉木」，並以「田牛脫轡眠方穩；野鳥離籠性始真」為喻，表明「平生心跡



圖一-a 清 乾隆4年 黃振效 雕象牙透花長方套盒（共11件）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例為本院現存與高士奇曾見過之大內異寶，工藝製作技法相類之文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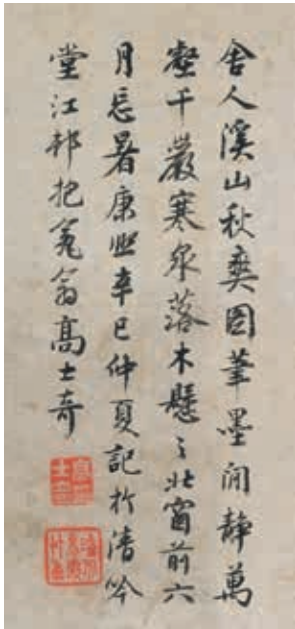
圖一-c 17世紀 西洋木雕高足套杯（現存79個）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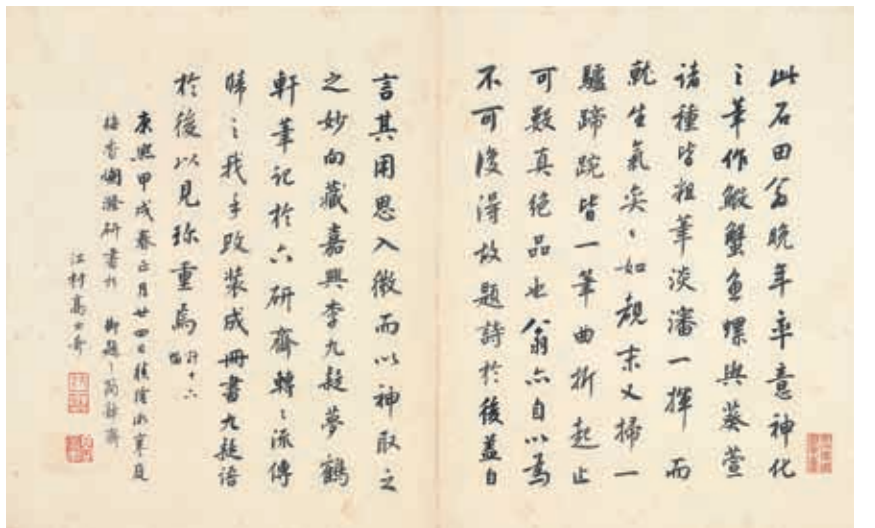
圖一-b 清 19世紀 廣東象牙鏤雕雲龍紋套球（24層）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六 明 顧正誼 溪山秋爽 軸 本幅高士奇題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四 明 沈周 寫生 冊 第11開 蟄蛭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後副葉高士奇題



圖五 明 陳汝言 喬木山莊圖 卷 拖尾高士奇跋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在「林丘」的高士奇，從其跋尾應時紀年的字裡行間，確實顯露出他是位深具花木情懷的愛花人。正月「積陰微寒，庭梅香爛」（明沈周〈寫生〉）；清明日「瓶插海棠碧桃」、酷暑時「建蘭已開，置廊下，香氣清馥。以寒泉沃地、冰簟鋪床」（宋夏圭〈長江萬里圖〉）

題跋內容

高氏向以賞鑑為名，其留在書畫文物上的題言跋記，以院藏品為例，或以詩句狀景，形塑出畫境；或是以詩詞附和主題（圖三）；或推崇創作者、交待作品遞傳。然以自身攬觀感受居多，不常表達出對作品本身在藝術表現手法上的個人評價。在明沈周〈寫生〉冊後副葉跋文，高士奇就是「以見珍重」地轉載前朝收藏者李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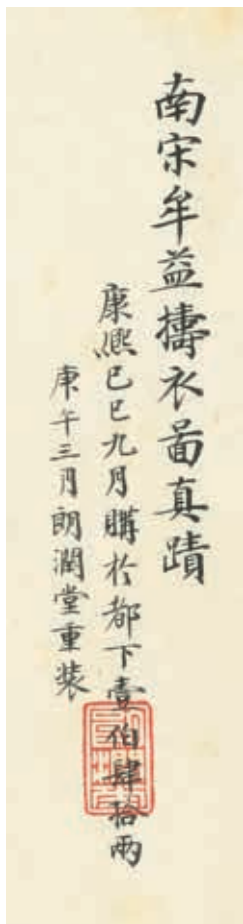
華（一五六五～一六三五）在《六研齋筆記》中的評語。（圖四）即使高氏有所評，也是概括而簡略，如明陳汝言〈喬木山莊圖〉拖尾跋言：「此喬木山莊圖卷，清逸幽遠，足當臥遊！又有明初數君題跋，誠逸品也」（圖五）；題明顧正誼〈溪山秋爽〉軸，則以「筆墨閒靜」稱之。（圖六）讚「內府所藏魯公所書朱巨川詰墨蹟一卷，奇偉雄拔，不為法度所窘，米老謂其龍蛇飛動見者目驚也」（見宋拓《朱巨川告身》冊）。

每每展卷觀題，有花草為伴，高氏落款前除了交待時節，還常提到有兩兒隨侍在側，儘管五十六歲時二子高軒病逝，但高氏後人仍有多人能世其家學。雖然清末民初徐珂

（一八六九～一九二八）在《清稗類鈔》一書中，舉「高江村子孫之豪」列入豪奢類，且指到了高興次子高嵩時，已中落。然而就院藏書畫文物上所見，除了長孫高岱留下鈐印外，尚有孫女高祥（有題詩具名：江村女孫祥，或即張照妻）及曾孫高涵的收傳印記，顯見高士奇的珍藏還是有部份曾在家族中遞傳。如院藏明董其昌〈臨月儀帖〉卷，在拖尾幅末有墨書「奎四號」上鈐高祥印記。（圖七）檢視石渠著錄，同樣標記形式，尚有「明董其昌臨諸家帖冊」及「元顧安風雨竹卷」，分在末幅、拖尾處注書有「奎廿三號」及「奎十六號」。若由此推論，高士奇孫女高祥分到的家傳書畫（或為嫁奩），最少就有二十三



拖尾幅末高祥鈐記 圖七 明 董其昌 臨月儀帖 卷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九 宋 牟益 擣衣圖 卷 拖尾幅末高士奇跋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件。這數量會佔高氏積累「三十年精力所聚」而成的收藏總數幾成呢？

底帳面世

幸運得是，隨著一本約當乾、嘉年間從高氏後人手中流出的私藏帳簿，再經羅振玉（一八六五—一九四〇）於民國十三年付梓印行，《江村書畫目》的公諸於世，讓高氏窮三十年精力搜羅到的書畫作品，無論在數量、品名、等次、來源、作用等方面，完全的揭露在世人面前，就連上述疑問，似乎也有了一個概數浮現。但也因為這是一本登載有入帳時價的帳本，並且分類歸列了這些藏品未來的功能目的，使得《江村書畫目》成為中國書畫收藏史及藝術市場價目上珍貴的史料。然而此目在康熙四十四年（一七〇五）六月揀定而成，其時高士奇已作古兩年，即使今天留藏於北京國家圖書館的「藍格精寫本」（圖八），業已非高氏手書本，因此經高氏後人傳錄繕抄成的此目，又有多少後加和改定？這又是此帳問世後引發的後續課題。



圖八 《江村書畫目》據錢存訓藏清「藍格精寫本」影刊 1968年香港龍門書店製版印行

《江村書畫目》依序分為上進手卷（計九四條名目）、送人之件（八六條）、無跋藏玩（三三條）、無跋收藏（三七條）、永存珍秘（六一條）、自題上等（三〇條）、自題中等（五一條）、自怡（七四條）、董文敏個人專輯（五三條）共九類。其中有記錄的時價，廉則一兩、一兩五錢，昂至貳百兩、五百兩，甚至有注明「原價千餘金」（「宋拓臨江帖三匣」）以及「看一百金」的「唐褚遂良臨蘭亭序一卷」。

雖然進、送大類下的書畫多有或「不真」或「贗」或「不佳」或「假」或「臨本」或「舊偽物」等小字注明，時價亦多只值個位數，但這並非絕對，因其中亦有標注為「真迹。上上」或「好的」或時價達二十兩的作

品在內。此外也有小字標注「送」卻歸入條目「進字號」類中，注「進」卻納入「送字號」類者；或是其他分類中已有小字標注「只可送人」、「可以進」、「可以送」者，並未揀入此二大類別中，所以書畫目中的分類和次序應經高氏後人增訂挪動過。並非全然如羅振玉當年付印時，在後記中所認定的「此目雖為文恪後人傳錄，而確出手定。」因而對作為進呈、饋遺分類下的作品「皆注明履迹，且值極廉者」；作為永存秘玩的太上神品「則真品而值昂」，這是高士奇「留此記錄以遺後人，殆不啻自暴其惡！」

其實書畫目中存在著不少自相矛盾，難理解之處，如「王右軍書鍾太尉千字文一卷」（今藏北京故宮）高氏自跋云購價八百兩，但書畫目載五百兩；院藏宋牟益〈擣衣圖〉卷，

拖尾跋「購於都下，壹佰肆拾兩」（圖九），書畫目只記八十兩。對於檯面上買價比檯面下實價高的現象，是可供想像的，但反之如「元錢舜舉秋江待渡圖一卷」跋載價參拾陸兩，卻登帳四十兩。案例不止此，是高氏另有用意抑是登錄錯帳？至於小字註明收藏用途上，如「宋拓保母帖一卷」因「天下只此一卷」故「永藏永藏。千金不易」，然而也有既是註「永藏」，也同註「可以割愛」（如「宋蘇東坡虎跑泉詩一卷」）。（圖十）《江村書畫目》會出現這種相左看法並列的註記且不求記錄嚴謹的現象，如同本院前副院長莊嚴在「藍格精寫本」影刊本序文所言：「編此目錄，純為個人備忘之需，而非問世之成稿。：然瀏覽之餘，正可窺測高氏之衷懷，譬若披覽私人日記，句句真誠」。

董氏粉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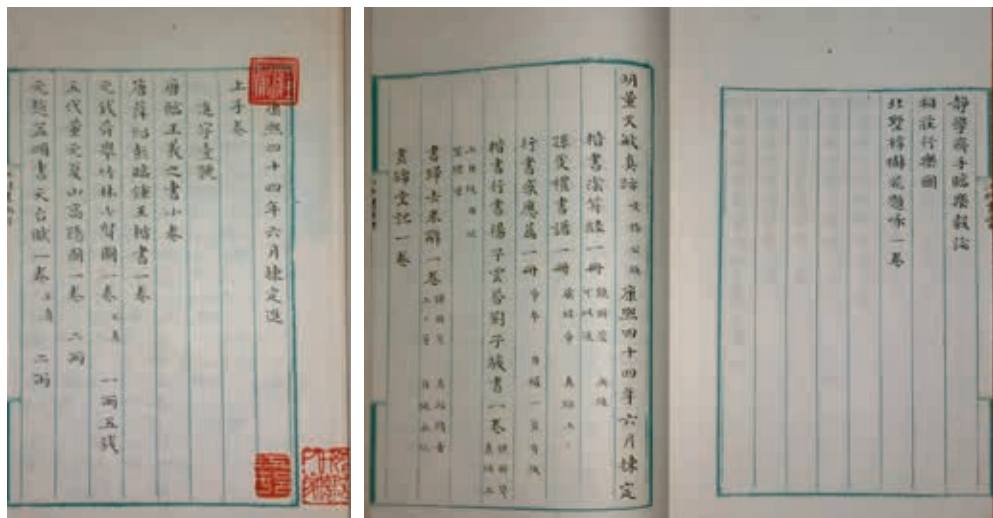
書畫目中羅列的書畫品名，從康熙四十四年六月揀定上手卷」及倒數頁「明董文敏真跡 文恪公跋 康熙四十四年六月揀定上手卷」。

當作品本幅為真，題跋至佳或最精，高士奇當然是以二至三位數價碼出手並歸列神品級。若本幅畫真，跋贗，出手價則至二位數；若是「畫不真，後跋俱真」標明的時價有少至個位數，但仍有被高氏註明「自存」者。而帳冊中只要經高氏註記有「贗」、「不佳」等相關品評，購價金幾乎偏低；若是低價收進但卻註有「真」、「模本之佳」者，表示這類就是高氏慧眼識得的良品，往往獲其自跋並註為「永存」；若註記「舊跡好的」、「舊摹本」類，即使售價來到十幾銀兩，高氏也願購藏。由此看出其賞鑒字畫的眼光，並不全然受文物當時市值所左右，或者因其為摹本而貶抑作品本身的藝術成就，評畫衡價的量尺存乎其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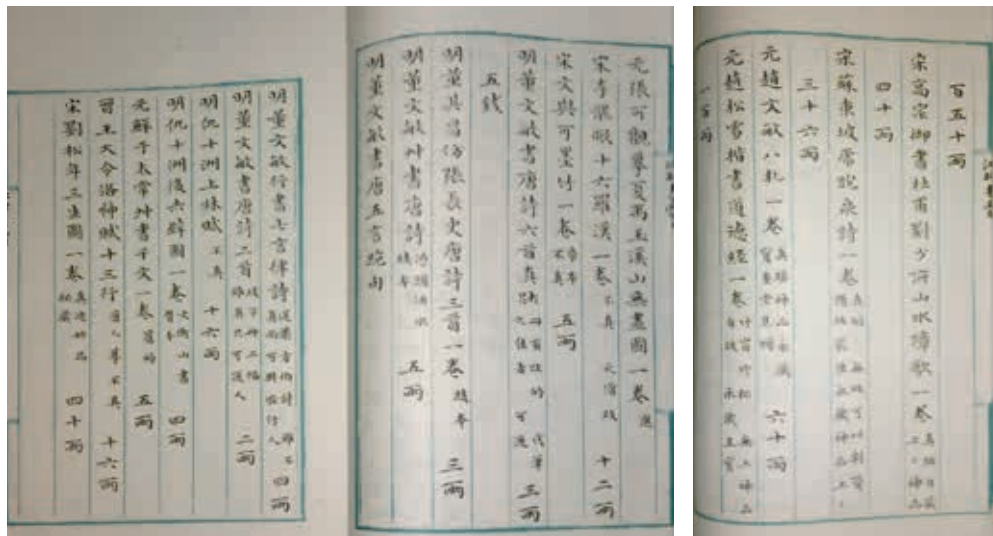
漢末諸葛亮、關羽的手稿（注可玩，歸送字號）到清初與高氏同為入值翰林的徐乾學、王鴻緒等人書蹟，其中以明代董其昌名下八十八條品目為最多。從這些董作中高興揀出有高士奇跋題者，歸為董其昌真跡一類外，另有十七條歸送、進類（其中僅一件註明為真的）。其餘十八條品目分納入「無跋藏玩」、「無跋收藏」及「自題中等」類中。這部份董作在高氏父子眼中應屬中等品質，其中「嚴居高士圖一卷」、「草書少陵斷句小卷」、「書唐詩六首真跡」三品名下，分註小字「真而不佳」、「亂真」、「代筆之佳者」。（圖十二）從這樣的品評中，不難體認高士奇對董其昌書畫筆墨技巧的充分掌握和對其作品水準的高度嫺熟。至於《江村書畫目》中記載了超過兩百位作者，約五百三十五件書畫（含碑帖）作品，何以董其昌的百來件為最大宗？就像是高氏曾在《苑西集》提過：「近喜收舊人畫竹」，相信這與藏家個人的偏好、搜羅的重心絕對息息相關。

康熙三十二年，高士奇將其寓目過的海內名蹟「親經品第足資鑑賞者」隨見隨錄，歷經三年編次成《江村銷夏錄》三卷。其中登載的明代書畫名家中，惟缺董其昌舊跡，其因就是高氏在凡例所提：「董文敏公書畫為近代第一，所見真蹟甚多，另為一卷」。雖然這擬籌編的董氏專卷並未面世，但由此也揭示，從萬曆以來董其昌的書畫才藝盛名不墜，作品在清初仍廣見流傳。一如《明史》對董氏的形容：「尺素短札，流布人間，爭購寶之。精於品題，收藏家得片語只字以為重。」高氏就曾說：「然觀宋元廣筆，豈若勝國真本，饒有趣味」，又據《山靜居畫論》載：「高唐事題白陽山人畫後云：『宋元之跡，大半為贗鼎。故余晚年，多購勝國名人翰墨。』」因此高士奇既有心搜羅前朝名人墨跡，對流布人間的董作，有機會眼觀並搜羅到手，當非難事。在「所見真蹟甚多」的陶養下，也無怪高氏有言：「文敏每遇鏡面宣箋則盡力作書，精神益見。」顯然對董其昌在怎樣的書寫條件下會有好的作品呈現，都已入眼了，成竹在胸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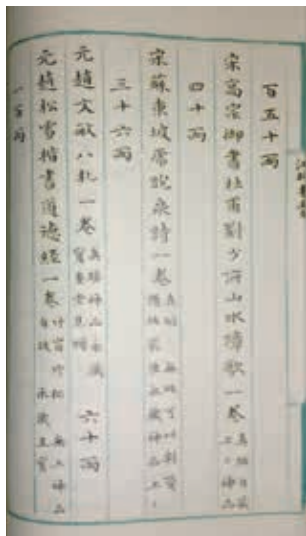
依《江村書畫目》首頁第一行「康熙四十四年六月揀定上手卷」及倒數頁「明董文敏真跡 文恪公跋 康熙四十四年六月揀定上手卷」。



圖十一 《江村書畫目》首頁第一行及倒數頁第一行。



圖十二 《江村書畫目》「明董文敏書唐詩六首真跡」品名下小字註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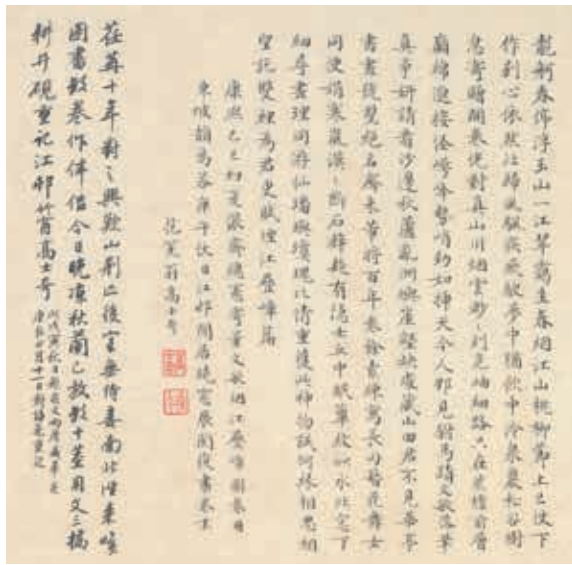


圖十三 《江村書畫目》「宋蘇東坡虎跑泉詩一卷」品名下小字註記。

院編修的他，分揀家傳書畫，並歸列出「進字壹號」、「進字貳號」、「送字號」、「明董文敏真跡」，應該是在為赴京所需打點。而其他條目（含原送字號），或才為高士奇手定，尤其全冊核心「永存秘玩上神品 康熙乙酉年六月審定」此分類下的書畫，高與應只是作了審核，而未加更動。

高氏密帳面世，帶出的疑問，不僅於此，關於目中訂為贗、假的作品，高氏父子，尤其是高興，以此進上的理由為何？真如羅振玉所言欲以贗品欺君？抑是如某些學者推測為應康熙辨偽的需求而進覽？還是純粹為打點內廷、應付皇上周遭所需？

不究用途目的，針對書畫目內容探究高氏收藏，其中不少流傳有緒的存世名品巨蹟，今已貴為海內外博物館的重要館藏，如本院典藏的宋牟益《擣衣圖》、清王翬《夏山烟雨圖》、宋米芾《蜀素帖》、明沈周《寫生》就屬國寶級文物。此外從帳冊中看出高氏搜購書畫，是以文物的整體作通盤性評價考量，不單以本幅真偽為限，如時價五百銀兩的「王右軍袁生帖」



拖尾高士奇跋



圖十三 明 董其昌 烟江疊嶂圖 卷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除了甚多董氏真蹟流通，易於收購外（唯《江村書畫目》歸為自題中等、真跡類的董氏作品，皆未註明時價，豈因收禮、受賄而來？其因尚不得解），對董其昌藝學的臣服，應是高士奇廣為收藏其作的重要原因。高氏曾跋言讚：「有明一代書家，自公出而盡掩前人，即元之松雪翁亦當退避三舍，所謂山川靈氣萃于筆端也」（見石渠「臨諸家帖冊」、「君不見華亭書畫號雙絕，名齊米芾將百年」（見院藏《烟江疊嶂圖》卷）（圖十三），其對董其昌書畫成就的推許，已直抵北宋名家境界。

至於鑑賞，高士奇更是以董氏為依歸——「華亭博雅鑒審確」（見石渠「宋李公麟蜀川圖」），以院藏元王蒙《琴書自娛圖》為例（圖十四），高氏跋言：「……董文敏題山樵《松窗讀易圖》云：『山樵為吳興之甥，畫法獨不似舅。一以巨然摩詰為師，故能自別門戶，所謂不向如來行處行也』……故而再依董氏對王蒙的看法寫下「……最愛山樵開門戶，不從松雪立規模……」句。此外高士奇還自曝

加重了高氏往後搜羅董作的力道：還是推波助瀾，讓康熙帝一生推許董其昌呢？恐怕兩者間的關係是互為因果吧！

藏寶巢庫

《江村書畫目》所錄五百餘件書畫中，有登錄裝潢形式者，幾為手卷，冊裝僅佔廿餘件，多屬董其昌真跡類，且全本帳目無一軸裝，這絕非高士奇搜羅文物時偏好某種裱裝形式所致，因其曾在跋文中提過「兩年

曾靠著董氏的眼光去重新看重手中藏品。起初「習於聞見兼失去題跋」以致李龍眠《蜀江圖》在手二十多年而不知其重，直到《瀟湘臥遊圖》入藏，見到董氏跋語，再回頭檢視舊藏的蜀江卷，方知皆為龍眠遺墨。高士奇不諱言此事，足見其對董氏眼界才學之推崇，若說他就是董其昌的長期追隨者，亦不為過。身為粉絲，計畫將過眼紀錄輯刊成專卷，並持續廣收其作，自是順理成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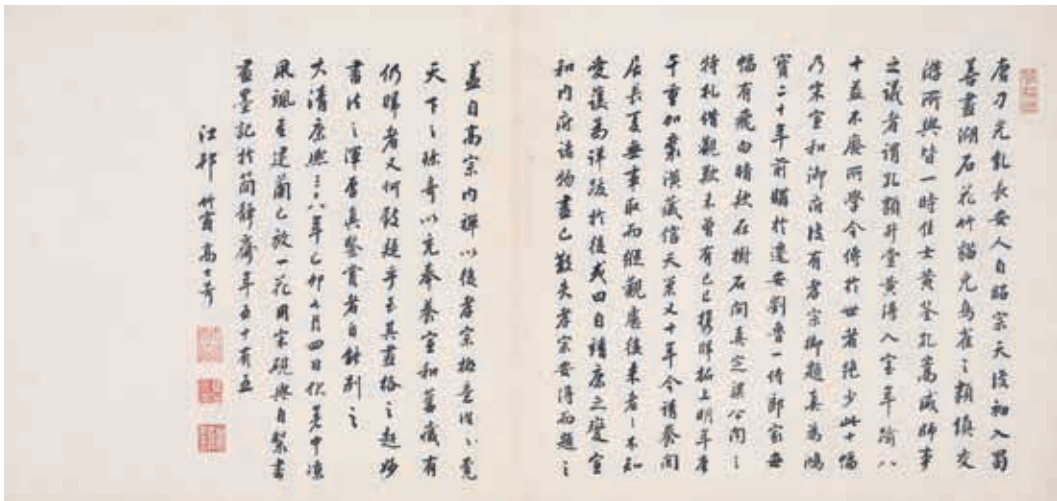
另高氏在題跋、《苑西集》中提到，在大內南書房入值時，如陳廷敬等學士就携來所藏名蹟，大夥公餘評賞，其中亦含董宗伯畫冊。這股賞玩怡情之風，必然君臣同好。其實康熙帝就曾自述：「朕少年好學：更耽好筆墨，有翰林沈荃，素學明時董其昌字體，曾教我書法。」、「朕萬幾餘暇，臨摹古人書法，於明董其昌真蹟尤加欣賞」，並多所讚美董氏是「天姿與功力俱優。若康熙帝觀書寫字常侍左右的是，因能書而入直南書房、又對董氏才學臣服的高士奇，君臣互動間對董其昌的加乘，是上行下效，

所得元人卷軸」，而院藏明沈周《寫生》現存的冊裝形式，即由高氏改裝而成。又經高氏收藏過的院藏文物中，有軸裝十五件、卷裝七件、冊裝六件，不在《江村書畫目》的紀錄中，其中包含國寶級文物，即前述的《夏山烟雨圖》卷、《蜀素帖》卷、《寫生》冊，此三件都有高氏題跋文，竟不見記錄在帳目中（三件中僅有「米南宮書諸體詩卷」即《蜀素帖》記入《江村銷夏錄》），又如前文述及的《富春圖》，亦未在此目中，因此合理推論，高士奇生前的書畫帳目不止一本，也就是經高氏入藏的書畫文物數量，將遠超過五百餘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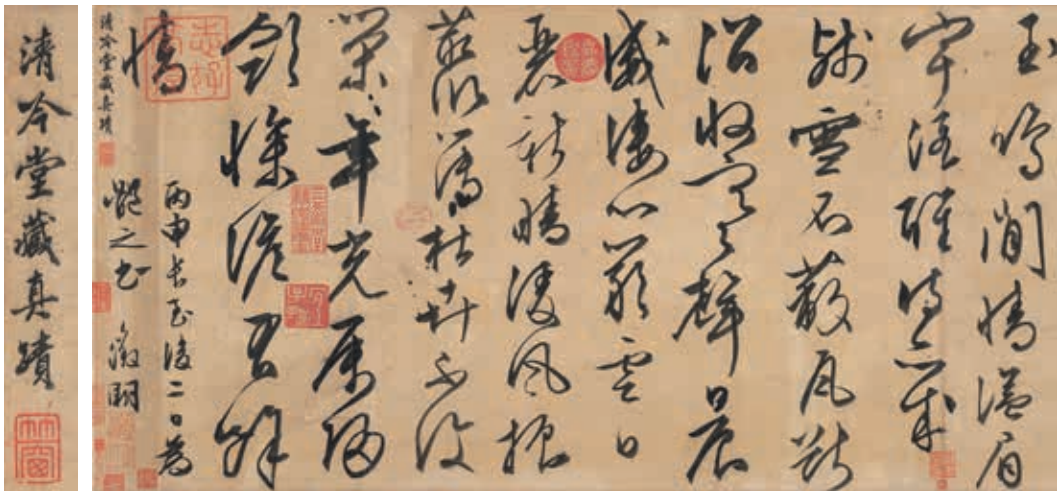
院藏文物經高氏題跋的廿九件中，五十歲後多在「柘西（柘上）簡靜齋」書題而成，之前的書題地，有「朗潤堂」、「苑西簡靜齋」、「信天巢」等處。（註一）其中多次提到文物留藏「信天巢」，如唐刁光胤《寫生花卉》後副葉高氏跋題（圖十五），其卅五歲時購得此冊，四十五歲携回柘上（即平湖），藏「信天巢」又十年，康熙卅八年取觀



圖十五 唐 刁光胤 寫生花卉 冊 第1開 桃花雙蝶磐石帶草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後副葉高士奇題

圖十六 明 文徵明 自書雪詩 卷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幅末高士奇題

後題記於「簡靜齋」。此外《石渠》記載有「明沈粲書千文一卷」卷後高跋：「…向日得其千文一卷，藏于信天巢。頃以銷夏展觀…記于柘上清吟堂」及「明陳粲寫生花卉一卷」卷後跋：「爲簡靜齋之一佳玩」。另院藏明文徵明〈自書雪詩〉卷（圖

十六），本幅末高氏題：「清吟堂藏真蹟」。據此推論高士奇位在平湖的「簡靜齋」、「信天巢」、「清吟堂」等處所，是其觀覽書畫、跋文題記的齋房，也是其收藏法書名畫的藏寶庫。因此在《江村書畫目》所列最後一條品目「山水真迹一冊十幅」下，（註二）注有小字「江村信天巢藏」，或許整本帳目爲何缺了掛軸的收藏，又爲何登錄未全？究其原，只是因爲此冊書畫目僅爲「信天巢」一處的收藏帳。若此推論爲真，高士奇



圖十四 元 王蒙 琴書自娛圖 軸 左邊幅高士奇題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書畫藏寶庫之富厚，不可小覷！而高氏晚號「藏用老人」，其中的「用」字，當有更值得推敲之處。●

作者任職於本院書畫處

註釋

1. 宋處士菊礪高翥，嘗以信天巢名其居，其高尚不仕，以詩聞于時。而高士奇以其裔孫自居，或因此故亦自號其居。
2. 院藏《明董其昌畫冊行十景》冊，本幅十開，墨畫山水，後副葉一開作者萬曆丙辰款識。全冊並無題跋，唯有高士奇之孫高岱（每開皆鈐印）、高祥收藏印記，故筆者疑其不同名目但爲同件作品。